

〔加〕罗纳德·C·基思 著
封长虹 译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



(京) 新登字100号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By Ronald C. Keith

This Printing: 1990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此书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0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张坚石 封面设计: 翟永莲
版式设计: 张秀翹 责任校对: 吴白桦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

[加]罗纳德C·基思 著

封长虹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 6.5印张 167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 00册

ISBN 7-5035-0502-8 / K·33

定价: 4.00 元

译 序

通过紧张的翻译，终于使这本关于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译著脱稿了。1989年初，译者曾翻译了由英国著名记者迪克·威尔逊撰写的《周恩来传》一书，从中对周恩来的一生有了一个较为整体的了解；今天，通过这本书的翻译，使译者更多地了解了周恩来一生的革命外交活动。本书作者罗纳德C·基思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他对周恩来的外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把周恩来的“理性外交”和“现实主义”精神作为本书的主要脉络，由此来展现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外交艺术及外交风格。作者认为，周恩来的外交才华与他早年的旅欧经历及30至40年代同国民党代表及美国特使的接触与谈判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的这些早期实践使他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创始人和革命外交家。周恩来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是中共中央外事方面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又是共和国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领导外交工作长达26年之久。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奠基者。当代的一些著名政治领导人，如斯大林、尼克松、艾登、尼赫鲁、西哈努克、尼雷尔、基辛格等，都曾对周恩来的外交才能表示极大的赞赏，都颂扬周恩来是一个非凡的外交家。本书介绍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万隆、巴黎、莫斯科、新德里等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并认为周恩来在这些活动中所持的方针、策略是扎根于现实主义的，而这种现实主义又源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之中。周恩来依靠毛泽东思想并通过毛泽东的支持，运用现实主义精神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冲破了美国的遏制、处理了与苏联的争端、实现了中美关系

正常化、恢复了中日邦交，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的翻译及出版对中国读者了解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有益的；同时，它对从事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研究及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作者是西方学者，书中的一些资料也源于西方的报刊、书籍，在某些方面，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看待中国问题的，希望广大读者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分析、识别。

封 长 虹

1990年11月北京

目 录

译 序	1
绪 论 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	1
第一章 革命中造就的外交家	12
第二章 冷战期间组建外交部	31
第三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遏制政策 的对抗	55
第四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苏分裂	83
第五章 周恩来、尼赫鲁及遭到破坏的“亚 非团结”	110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42
第七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方针和现实主 义精神	167
第八章 周恩来的遗产：走向“独立自主的 外交政策”	196

绪 论

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

外交实践在历史上常常被认为是欧洲的君臣外交，然而，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却出现在中国革命大动荡这一混乱环境之中。很明显，周恩来的外交是产生于中国具体的国内氛围之中的，但其本身却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作为一个旅欧的中国留学生，周对欧洲的外交实践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他成年后的岁月里，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他不得不亲自与欧洲的国家体制对大多数的亚非国家所造成的扩张影响进行斗争。

作为一个献身的革命者，他常常与欧洲各国外交所维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发生冲突，而当后者要加固这种不平等的模式并增强亚洲及非洲国家对殖民主义的依赖时，这种冲突则显得尤为激烈了。

周恩来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显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周恩来所了解的中国革命经历是否排除了“理性”的外交实践呢？周恩来最终是个革命外交家，而国际上则公认他为完美的外交家。

作为从1949年至1958年2月的外交部长及1949年至1976年1月8日他去世止的国家总理，他对中国的外交实践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杰出的“人民外交”，并制定了对外进行援助的方针。周的“理性”外交在看起来难以消除的冷战气氛中灵活地战胜了美国的遏制。后来，他那敏锐的智慧和顽强的政治活力在“文化

大革命”中经受了人们所能忍耐的最大极限的考验。然而，他在70年代初便看到要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国际政治联盟进行重建和扩大，还为当代中国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人们对周恩来的外交所作的一些描写，是现代中国外交史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然而人们对他的外交生涯所进行的研究既容易引起争议，同时也进行得很艰难。除了少数情况之外，中国国内的一些文章只能是对周的过去和往事进行缅怀，并由此来分析他的外交原则和外交实践。国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那种早已把个人传记与“个人崇拜”等同起来的现象，都抑制了中国人对周恩来的研究。

西方有一些关于周恩来的传记，但这些传记常常把周的外交技巧和对外政策作为对他的根本心理因素进行的附带分析，并以此来解释他那复杂的政治品格。约翰·鲁茨在传记中指出，冷战期间，西方新闻机构都被周这个“神秘人物”所吸引，从而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描绘，如“灵活的布尔什维克”、“弹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的斯芬克斯”^{*}等等。

甚至在周恩来去世之后，他这个“谜一般的人物”仍然引起了许多观察分析家的好奇。这些人想通过对周的性格进行心理分析来解释他的“实用主义”。迪克·威尔逊在他所写的《周恩来传》中则想通过周恩来那种难以理解的情感和动机的复杂性来对周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进行解释。威尔逊得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说周恩来“用不同的方法使自己处身于不同的文明之中”。许多外国人已看到了周的行为和特征所具有的价值（这一点对外国人本身来讲看得很重），而这一事实则说明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外交家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 原文为Sphinx，意为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比喻为“谜一般的人物”——译者注。

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发生冲突时的困境中仍然能够获得妥协，这一点或许可以根据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来进行解释。一些外国崇敬者——尤其是法国人——把他的个人魅力比作当代的具有儒家学究气的君子。当然，尼赫鲁在50年代也曾确信，古代中华文明久负盛誉的传统最终将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中再次得到体现。甚至那些曾在外交事务中与周恩来共过事而至今仍然健在的人都强调说，周的外交战略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

然而，周恩来自己对儒家历史的态度则是复杂的。40年代初，他就驳斥过蒋介石虚伪的“诚实品质”，并把蒋介石“固守中庸”看成是对“传统的一般意识和剥削阶级的伪善”的一种反应。然而，1949年4月，周在与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分析传统”需要对儒家历史的积极方面进行研究。儒家历史中“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与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不一致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目前的分析认为儒家学说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导及外交具有某种联系。

例如，舜王乐于不耻下问，并善于研究由于不同意见而造成的冲突，以便把握冲突的两个极端，从而在决策中制定“不偏不倚”的方针。“中庸之道”表现了一种“不卑不亢”的修养，而这似乎与现代外交有着一定的联系。然而，这种“不偏不倚”与共产党的辩证法思想是不一致的。后者既强调对立，又强调统一，这个原则是复杂的政治现实环境中得以灵活运用的唯一思想基础。这种灵活性由于在对“客观”现实进行的过程中运用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它有别于“庸俗进化论”。

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周在其外交政策中是否接受了“实用”的“权力平衡”。基辛格认为，周对欧洲古典的权力平衡具有一种直感。一些观察家把这种平衡的现代实践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战略实践。在造就周的外交过程中表现出的中国古典思想和战略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轻视的，同样，人们对当代中国

的分析也是不可轻视的，因为这种分析描绘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的实际和现实内容。邓小平在1976年1月15日追悼周恩来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并没有反映出周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带有矛盾之处，并强调周在国际上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及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

对周恩来所具有的中国人的性格进行研究是很有用处的，周恩来的“外交”是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者的缠绕中演变而来的。如果说周恩来在国际事务中是个“现实主义者”，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对他的外交所进行的综合性解释与说明都包含了中国式马列主义的思想范畴。“工作作风”、“方针政策”之类的概念在周恩来有关领导原则和涉及到对现实进行观察的政策和方法、对国内外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我们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外交与一般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就会确切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的实践。

“工作作风”这一概念起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思想上讲，它包含了一种自律的标准，对“客观”政治现实的一种良好的策略上的反应，政策发展过程中的集体与民主协商以及个人的研究和深入调查，而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实事求是”这一认识论基础之上的。

“方针”与“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两者在使用过程中几乎可以相互交换。这两者放在一起则被认为是“指导路线”。弗兰兹·舒尔曼对两者进行了区分，认为“政策”指的是“具体的政策”，而“方针”指的是“总体的政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对两者进行了更为清楚的区分，认为“方针”指的是一种指导思想的理论，与指导路线相关，而“政策”则指的是一套实施原则，或叫“行动准则”。

尽管周恩来在西方受到人们的推崇，被人们看成无与伦比的外交家，但是，他对“外交”的解释与西方国家教科书中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已故的赫德利·布尔教授认为，外交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通过官方用和平方法在世界事务中具有立足之地的其他实体之间的行为关系”。周恩来确实认为在国与国之间有必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和平谈判，但是，他把“外交”看成是某种方式的战争的继续。周恩来曾向一些年轻但却思想敏感的外交官讲述过“两种战争”的区别，认为“外交”是一种与“枪战”相反的“舌战”。

周恩来最终还是希望寻求一种世界政治的转变。他把“外交”看成一种高度的政治化过程，它既不局限于世界政治中“具有立足之地的实体”，也不把它看成是“官方的代理人”。在抵制美国的遏制及获得更为广泛的国际承认的斗争中，周恩来十分重视国际舆论的力量。人们可以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统一战线政治的舆论实践中发现“人民外交”的起源。

在周恩来看来，宣传工作是外交过程中十分自然且十分合理的一部分。在周恩来早期有关工作作风的指示中，他敦促当年在武汉的同事们要做到“五勤”，即要在五个方面做到勤快。这样，他的这些未来的外交家们要阅读毛的著作和党的文件，要倾听并收集各种来自不同地方的意见，要宣传党的政策，要亲自处理外交事务以求“自力更生”，同样，还要走出去与人们接触而不是等待他人前来拜访。“五勤”可以运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工作之中。

周恩来在看起来十分曲折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获得妥协让步而表现出的杰出才能是令人感到神奇的。所以，许多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他的外交是“实用主义”的。为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曾对周恩来加以抱怨，说他这样做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周恩来对霍查未能理解列宁的话“妥协再妥协”而感到遗

憾。周恩来认为，霍查以及那些跟他一样的教条主义的空想家们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精神。

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正式起源于毛泽东关于“矛盾”和“实践”的辩证法理论。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要求人们做到实事求是，周恩来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工作作风”总是非常富有理性的。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周恩来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自如。在外交和对外政策中以及政治活动的所有方面，周恩来的“方针政策”的产生总是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有着明显的关系，从而使其1949年之前在统一战线方面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认识得到了人们最大程度的承认。

在西方，外交事务中的“实用主义”似乎意味着这样一种能力，即能够处理因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和国际政治等级结构所造成的不平等而导致的潜在的强权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讲，“实用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外交事务中从未正式得到过认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周恩来的名字很少与“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实用主义”本身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因为它反对科学的、必要的思想方法。然而，周恩来的政治对手曾的确企图把他的“现实主义”当作“经验主义”来看待。在1941年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断而又有效地强调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仅仅是一种书本理论中的主观臆断，往往是会导致失误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被指责犯有“经验主义”的错误；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有人含沙射影地攻击他为“最大的儒家”，并对他在当时想方设法保护革命力量也进行指责。

• 此处指的是革命组织中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的错误倾向——译者注。

他被说成扮演了历史上的“反动”宰相司马光这一角色，而司马光曾百般地反对过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王安石。

1975年初，周恩来的病情开始恶化，然而，他的那些无情的反对者们此时却把“经验主义”称为“主要危险”。他们的用意遭到了毛泽东的亲自否定。正如40年代初期党的整风时期一样，毛认为国内外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必须既反“经验主义”，又反“教条主义”。顽固反对周恩来的一帮人作为不成熟的“理论家”被打散了，他们还要再学一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

“经验主义”与党的“实事求是”这一正确的认识论之间的区别，在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意识形态偏激做法中被混淆了。只是在1968年9月之后，周恩来才渐渐能够对中国政治生活中“实事求是”的作风加以恢复。

这里，我们对周恩来的“现实主义”的起源及政策内容所进行的分析说明了中国分析传统的理性方面仍然是很重要的。赫德利·布尔对“外交”所作的解释要说明的问题是，在革命的正义与理性的外交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对立？然而，就周恩来而言，这一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西方的一些分析家们认为，周恩来是一个温和主义者，他不支持国内的某些激进观点。不过，这种看法是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什么会走向正常化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合作是成功的。宋庆龄对周恩来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表明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最大程度地扩大”中国与各国关系问题上进行了真正的合作。

我们应该认识到为什么这么多的西方观察家都认为周恩来是现实主义的，而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目前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的潜在趋势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认为，周的外交政策之所以获得了成功是因为他摆脱了有关的约束，然而大量的事实却表明周恩来的方针政策是根据毛泽东自身的思想

而不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得到了人们正式的承认，它是整个一代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括周恩来本身。

众多的使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在1949年之后得以维持并得以发展的思想起源于1949年之前这段时期内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统战斗争。事实上，30年代至40年代的“外交”事务是由党组织处理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种“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毛泽东有关抗日的著述及其有关国际问题的思想。1949年之后，毛泽东曾对1949年之前的统一战线政治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并由此渐渐地形成了他的思想原则，而这种思想原则为新政权的外交提供了“理性”的基础。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突出地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外交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是外交行为和外交决策的“非理性”基础。例如，肯尼思·华尔兹在其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中着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对外表现。华尔兹引用了查尔斯·比尔德关于“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一观点之后说道，现代马克思主义得利于国内政治，在外交政策方面获得了事半功半的成就。

在西方的理论中，“现实主义”常常宣称，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国家间的关系应该遵循那些比国内政治的独特内容更为具体的体制制度。华尔兹的分析试图从冲突中的个人行为、国内政治及国家关系的体系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方面对外交政策进行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理论强调了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之间既明确而又含蓄的关系。早在本世纪20年代，这种理论就强调了有关世界大战的国际发展趋势，而国际问题在战略上的概念化影响了在策略上对民族分离状况的理解。周恩来对自己的“方针政策”所作的详尽解释胜过了这类理论的分析。

中国人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分析问题的，然而，他们却对国际政治进行现实的评价极为感兴趣。人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得以存在下去。当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国际关系所抱的看法与对各国的国内社会、经济及政治力量的总体所进行的分析的确有关的时候，人们便不会否认中国领导人或周恩来本人有能力来对与其他国家相比而言的中国国力问题作出明智的判断。有人认为，中国的国际行为的确是从它对国内政治的认识中派生出来的，但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是如何作出与其优先考虑的国内问题有关的决定和打算的。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国内现象，所以，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同样如此。

本书各章将集中对周恩来的外交按时间顺序进行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如何形成了他的“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从而获得了现实的和成功的外交的。尽管中国国内领导层变迁重大，但周恩来仍坚持努力，试图对国内外政策有一个理性的、经过深思的理解。

周恩来的外交及其政策终于战胜了美国的遏制。在日益改善的中美关系和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中，周渐渐制定了一种新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是根据中国对其自身多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经历的认识而制定的。它植根于国际关系中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一种思想认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周恩来构想出了其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此作为国际行为的准则和反对新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一种方针。事实上，中国当代“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的基础之上的。

从历史上看，外交家们始终不得不面对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难以处理的政治矛盾所具有的复杂性而作为一种反应，外交对人们具有一种理想的要求，即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及友好国家和

敌对国家的利益要抱有一种明智的认识。周恩来相信外交的力量，但他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过程。他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即外交需要进行不断的谈判，即使这些谈判暂时无法获得成效。

周恩来在外交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著名外交家欧内斯特·萨托把周的外交实践描绘为“运用智慧与策略来实施政府间的官方关系。”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其意识形态是在20世纪非殖民化的状况下要求独立的过程中自觉形成的。

周恩来的外交是否真正地发现或充分地重视了人们所共同认识到的国家自身的民族利益所具有的一致性呢？基辛格曾强调要用“实用主义”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一致性。他曾告诫尼克松总统不要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是要在对相互利益的评估基础上来加速这种一致性的实现。基辛格认为，周恩来在谈判所达成的、于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接受了上述说法，并把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描绘为：

当然，我和周恩来都进行了互相的利用，而这却是一个级别上所要达到的外交目的。但是，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实现目标的一致性。在外交政策中，人们务必不能忘记这么一点，即他在与同样的人打交道时要处理那些反复出现的事情；玩弄花招只能得到眼前的利益，而失去的则是实质性的东西。甚至在对手之间，信赖也可成为国际秩序的粘合剂。狭小的心理是相互间关系的仇敌。周恩来理解了这些，并且，我们所获得的不仅是一致的东西，而且还是在历史的这一特殊时刻对我们的相互利益运用国际均势时需要什么作出比较分析。

周恩来在谈判中所表现出的灵活机动并没有使他自己附和于基辛格所说的“国际均势”。作为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外交家”，周恩来如果认为战术上的灵活性可以达到战略上的目的或实现

“坚定的原则”，那么，这本身就是革命实践的根本经验。1949年之前的中国革命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它反对极端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周恩来并没有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搞“国际均势”。

中国当代外交政策的内容所反映的正是那些构成了周恩来的外交作风和外交实质的“方针政策”。

第一章

革命中造就的外交家

在解释什么是“外交”时，已故的赫德利·布尔曾指出，在各国都普遍声称自己是正义的情况下，外交是不能够得到成功运用的。由于革命总是如此明显地包含了正义，所以，当某一国际环境通常具有权力的等级特性及民族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竞争特性时，在其中进行外交实践确实会造成一种理论上的困境。赫德利·布尔的这种说法并非那么出乎寻常，因为正像人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和社会改造的理想观念中所预示的那样，革命常常与理性的方式和法定的程序形成了一种对比。

然而，周恩来在革命斗争中进行的外交实践，使人们产生了若干有关的疑问。周是如何亲自考察国际关系的现实的？他那著名的“现实主义”观念的根源是什么？他如何使国际政治的结构特征概念化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根据周的经历、个人政治生涯及其完善的理智，对他不断形成的现实主义和他由当代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中的相关的变化所产生的洞察力按年代进行阶级性的分析。

周是在日本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在20年代初才在欧洲熟练地掌握了列宁主义。这种主义明确地驳斥了当时称之为符合潮流的欧洲社会民主，以突出表明其无产阶级的重要革命作用。周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源于列宁主义关于外交政策及外交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对外延伸这一基本理论的。

周赞同列宁关于必须铲除“左派幼稚病”的主张，并高度评